

2007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学校代码：10269

学 号：51040202009

華東師範大學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初探

院 系：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专 业：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研 究 方 向： 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指 导 教 师： 胡 逢 祥 教 授

硕 士 研 究 生： 王 雪 玲

2007 年 4 月完成

2007 届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

学校代码：10269

学 号：51040202009

華東師範大學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初探

院 系： 人文学院历史系

专 业：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研 究 方 向： 中国近现代史学思潮与流派

指 导 教 师： 胡 逢 祥 教 授

硕 士 研 究 生： 王 雪 玲

2007 年 4 月完成

Dissertation for Master Degree in 2007

University Code: 10269

Student ID: 51040202009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The Initial Researches for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eloo University

Department: History Department

Major: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y

Speciality: Historical Theories and Schools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Tutor: Prof. Hu Fengxiang

Graduate student: Wang Xueling

Finished by May 2007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我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说明并表示谢意。

作者签名: 王雪飞 日期: 2007.5.23

学位论文授权使用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华东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用于非赢利目的的少量复制并允许论文进入学校图书馆被查阅。有权将学位论文的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王雪飞 导师签名: 王雪飞
日期: 2007.5.23 日期: 2007.5.23

王雪玲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姓名	职称	单位	备注
谢俊美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主席
邬国义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评阅人
房鑫亮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评阅人
王东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答辩人
房鑫亮	副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答辩人
路新生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答辩人
邬国义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答辩人
谢俊美	教授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答辩人

论 文 摘 要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是齐鲁大学参与哈佛燕京学社的中国文化研究合作计划而建立的教学研究机构,也是当时中国教会大学中较具代表性的一所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它创建于1930年秋,至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因齐鲁大学停办而撤销。本文试图通过对该所建立、发展过程,及其学术运作概况的系统考察,对现代史上这类机构的活动特点和实际影响等作出更为真切的整体把握。

齐鲁大学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最早创办的教会大学之一,由美、英、加三国教会联合创办。20年代后期,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影响下,齐鲁大学顺应教育界、文化界“整理国故”思潮涌动的大势,利用美国霍尔基金给予的契机,参与哈燕社在教会学校组织的国学教育与研究计划,建立了一所教学与研究并重的国学研究所。此后二十余年间,尽管国内局势动荡不定,但它始终围绕着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教学目标,延聘师资,改进课程设置,加强本科教学,提高国学教育水平,契而不舍。同时,它还一直注意加强图书收藏、古物收集等基础建设,即使在战乱条件下,仍多方筹措,取得不少成绩。

在国学研究方面,其成就也较为显著。就齐鲁大学建立国学研究所的初衷来说,着眼点更倾向于这方面,只不过因为不同时期而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和问题,所取得的成绩也各异。抗日战争爆发前,国学研究所地处山东济南,工作主要集中于考察古迹、收集古物材料和辨伪校订、整理古籍两个方面,着重于打基础,在研究的深度上与国内相关学术前沿存在着相当距离。抗战中西迁,在成都招揽了不少国学大家入所,使其面貌大变,并在研究风格和分量上都与前一阶段大不相同,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可圈可点,并编辑出版了《齐大国学季刊》、《责善》半月刊、《齐鲁学报》、《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等学术杂志,不仅在当时学术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不少成果至今仍为学者所称道。

当然,齐鲁大学作为一所小型综合性大学,在资金、规模等方面的力量仍然有限的,加之作为霍尔基金管理单位哈燕社以及当时动乱局面的牵制,决定了其发展中的坎坷不平。它的成功和不足,对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国学研究和教育都有着一定的教训和启示。

关键词: 齐鲁大学 国学研究所 国学教育

ABSTRACT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eeloo University is a teaching and research facility, which is established because Cheeloo University participa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orporate plan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It is a representative humanities scholarly research organization in China's Church University at that time. It is established in 1930 fall, and vanished in 1952, because the Cheeloo University is canceled in the country's adjust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This article is attempt to inspect systematically about the establishment, development and the cademic operation survey to have a clearer overall assurance about this kind of organization's a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Cheeloo University is one of church universities which is the Western missionary organized most early in China. It is united established by American, Britain and Canada's Christianity church. 20's later periods, under a series of social movement influence, Cheeloo University used American Hall fund's turning point, participated in the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corporate plan of Harvard—Yenching, established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which is pays equal attention to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establishment adapted the tendency of the educational circles 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Hereafter during 20 remaining years, although the domestic situation is unstable, but it always revolves the Chinese cultu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goal, employs teachers, improves curriculum, enhances the teaching of undergraduate course, raises the Sinological education level, never give up. Simultaneously, it also always pays attention to enhance infrastructures, such as books and antiques collections and so on. Even if under the chaos caused by war condition,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still raised it in every way and obtained many achievements.

In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aspect, its achievement is also remarkable. As far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s original intention is concerned, the focal point is more tend to research aspect. Just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time's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questions, it obtains different achievements. Before Sino-Japanese War eruption,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is in Shandong Jinan, their works are mainly concentrate in two aspects ,one of it is inspects the historical site and collect antiques materials, the other is distinguishes falsely checks against the authoritative text and the reorganization of ancient books. This stage emphasizes the foundation found, so has certain distance in the research depth with the domestic correlation academic front. After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moves to Chengdu, gathered many national studies master enter the institute, that large changed its appearance. Compare with preceding stage, this stage is entirely different in research style and component, and obtain achievements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scholarly research, personnel training and so on. They also edit and publish many academic magazines, such as *Cheeloo Quarterly*, *Tse Shan Bi-weekly*, *Cheeloo Hsueh Pao*,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and so on. All of

these not only produced positive influence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that time, but also many achievements still praised until now for the scholars.

Of course, Cheeloo University as a small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in many aspects are still limited, such as fund, scale strengths and so on. Additionally, the restriction from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nd the turmoil situation, has decided its uneven development. Its success and insufficiency, to us today scholarly research, in particular the national studies research and the education all has certain lesson and the enlightenment.

KEY WORDS: Cheeloo University the Sin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Sinological Education

目 录

第一章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始末述略·····	1
第一节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创立·····	1
第二节 风雨飘摇二十年·····	6
第二章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建制与运作·····	13
第一节 师资结构及各项基础建设·····	13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国学教育·····	17
第三节 研究生教学的尝试·····	20
第三章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术成就与影响·····	24
第一节 战前的国学研究及其特点·····	24
第二节 走向学术前沿：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崛起·····	26
第三节 甲骨收藏与研究·····	27
第四节 学术期刊的编辑与出版·····	30
附录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职员一览·····	35
参考文献·····	40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初探

在中国近代教育发展史上,教会大学的存在和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思想的不断趋于解放,人们对此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教会大学与现代国学教育的关系,便是其中的热点之一。笔者以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为现代中国学术发展史提供一个新的视点,因而选择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作为考察的对象。

齐鲁大学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最早创办的教会大学之一,由美、英、加三国教会联合创办,其前身为 1864 年由狄考文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1917 年正式成立齐鲁大学。1930 年,在美国霍尔基金的资助下,该校建立了国学研究所,其活动先后持续二十余年,是当时中国教会大学中较具代表性的一所人文学术研究机构。对它的活动,近年来陶飞亚、吴梓明所著《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和陶飞亚的论文《哈燕社与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均有所讨论。不过,由于这些论著的着眼点主要在探讨教会大学与国学的关系,涉及该所内部组织和运行等问题不免有些笼统,故不揣简陋,特作此篇。希望运用有关档案、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对其建立背景、发展演变、内部编制、运作等作进一步的细致考察,以求对其作出更为真切的整体把握。

第一章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始末述略

第一节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创立

齐鲁大学(Cheeloo University),即山东基督教大学(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最早创办的教会大学之一。齐鲁大学的前身可追溯到 1864 年由北美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Mateer, Calvin W.)成立的登州文会馆,中经潍坊广文学堂等阶段,1917 年始迁至济南与医学院合并成立齐鲁大学,校内设文理、医学和神学三院,经费由设在纽约的美、英、加拿大三国 14 个基督教差会联合托事部提供。

传教士创办齐鲁大学的根本目的自然是“传播西方基督的福音”,故其教学内容不仅偏重西学,且渗透着相当的神学意味。但出于入乡随俗和吸引中国人的

需要，在文会馆时期学校就设置了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齐鲁大学成立后，又在文理学院内建立了国文系和历史系，以保持这方面的课程内容，只是教学方法比较陈旧，“历届国文系的主任和教员，都是擅长八股文的举人、拔贡之类的老夫子”。¹直到 20 年代后期，这一状况才在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影响下不得不有所改变。

五四运动前后，随着阵阵“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激越呼喊和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日趋高涨，思想界的一些爱国人士从维护民族独立和自尊的立场出发，开始运用现代观念重新审视民族文化；而科学理念及其方法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则又给传统学术的研究以全新的刺激与动力，在胡适等人极力倡导“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引领下，国学研究思潮在学术界蔚然兴起。在高校系统，自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国学门后，厦门大学、清华学校、中山大学等也纷纷建立相应的国学或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机构，由此拉开了国内高校国学教育和研究的新局面。

相比之下，齐鲁大学此时的国文课程却仍承袭清末以来的旧习，专以诵习“四书五经”为主，这在整个社会逐渐转向重视新式教育的氛围中本就易遭人诟病，何况作为一所西方人办的教会大学，其文化和宗教观念向与中国本土民众存在着种种隔阂和冲突，由此使这方面的矛盾更趋突出，如 20 年代初共青团济南地委的报告中即提到“此地基督教会的势力，较任何地方的都大”，教会学校占了全省中等学校的大多数，齐鲁大学“居然在社会上博得山东最高学府的盛名”。²这一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担忧，认为西方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办学校，学生是中国人，却丝毫不受中国政府的监督管理，这是完全不合理的。有的还直指齐鲁大学的教育是文化侵略，认为其教育的宗教性和非中国化都亟需改革甚至去除。而北洋政府 1925 年颁布的私立大学注册立案规定中，第五、第六条都列有“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和“学校课程须遵照部定标准，不得以宗教科目列入必修科”的相关条文。³这些规定对于教会大学来说似乎难以接受，加之当时时局动荡，以致影响了齐鲁大学注册立案的成功。南京政府成立后，在这方面的规定显得更为严苛，如要求校长必须是中国人，学校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必须是中国

¹ 许慕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简介》，《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4 年版，第 150 页。

² 《济南革命历史档案》，第一辑，第 126 页。

³ 刘廷芳：《关于教会学校在政府立案事宜》，《通讯》，第 2 号，第 5-6 页，中国教育协会，1925 年。

籍等。鉴此，齐鲁大学不得不作出回应，乃于 1929 年向山东省教育厅递交了立案申请文件。但当教育厅派人视察齐鲁大学时，却对其提出了一系列批评：“第一，他们拒绝参观神学院，因为这样的机构是不能注册的。第二，他们坚称图书馆不合格，当时该馆藏书仅 24000 册……第四，他们指出一所想要注册的大学必须至少有三所学院，而齐鲁除去神学院的话，就只有两所学院了。第五，他们宣称，一些文理学院的教师不够资格。第六，他们强调董事会成员中必须有 2/3 的中国人，而不仅仅是占多数。”⁴同年 10 月底，学生为促使校方尽快立案，开始罢课，掀起了反对教会奴化教育、争回教育权的学潮。进入 11 月，校内出现混乱情况，有的传单还写着“我们所有人要求收回齐鲁的教育权，我们希望摧毁所有文化渗透的巢穴……这个机构在摧毁中国人思想生活方面的影响，要比克虏伯大炮指着我们胸膛更危险”，并宣称要消灭“这个阻碍中国进步的障碍物”。⁵

面对这一状况，齐鲁大学为申请立案成功，不得不加强国学教育，希望以此吸引一些优秀学者入校任教，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并获得中国知识界和教育界的认同，促使立案成功，减少日后发展的阻力。以此为目标，齐鲁大学开始采取了一些机构改革措施，如把原来的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和理学院，增加中国人在学校管理机构的名额。文学院的地位遂因此较以往有所上升，而一些熟悉中国历史文化的中国人士也开始在校务中有了一定的发言权。

1924 年冬，齐鲁大学国文教员于兰洲因病去世。次年，学校接受学生推举，聘请醉心墨学研究并成绩斐然的栾调甫为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栾受聘后，开始在教学中加入古代学术研究的内容，设想在进行国学教学改革的同时加强国学研究。此举受到学生的广泛欢迎，但其设想一直苦于经费短缺，也难以得到校方更多的支持。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齐鲁大学在经过立案风潮的冲击后，校长、副校长都因风潮压力或个人原因先后递交了辞呈，文理学院被分开后也都没有院长。而学校的经费则因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教会募集资金困难而陷入了某种困境。正在这时，美国霍尔基金的一项政策为其带来了福音。

霍尔基金是由美国铝业大企业家霍尔（Charles M.Hall,1963-1914）的遗产所建，霍尔在去世时的遗嘱中规定其 1/3 的遗产必须用于资助由英美人管理下的亚

⁴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65 页。

⁵ 同上，第 167 页。

洲或巴尔干地区的教育事业⁶。遗嘱公布后，包括齐鲁大学在内的六所中国教会大学都向其进行募捐，并获成功，由此组建了哈佛燕京学社（以下简称哈燕社）作为交流学术和管理部分基金的机构。齐鲁大学不仅在此中获得了 15 万美元以发展其医学院，还可在哈燕社掌握的限制性开支中，划出 20 万美元专用于资助国学教学与研究，但这一款项需在哈燕社的监督指导下按年发放，并只能用于国学教学与研究之用⁷。这笔接近文学院常年经费两倍的资金无疑对齐鲁大学有非常大的吸引力。鉴于当时该校文学院的师资等条件都很不理想，为了符合得到资助拨款的条件，齐鲁大学开始积极筹划关于国学教育和研究的具体计划与行动。

考虑到齐鲁大学地处山东这一齐鲁文化胜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因而在国学研究上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所缺的只是系统组织与经费支撑。因此，以霍尔基金的支持为契机，时任齐鲁大学国文系教授的栾调甫提出了组建国学研究所的构想，并得到了校方大力支持。

1930 年，齐鲁大学董事会任命林济青⁸为文学院院长，重新规划文、理学院，以期为学校发展打开新局面，并继续争取立案成功。林受命后，即于 1930 年秋正式成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并委任栾调甫为国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⁹

按照霍尔基金的使用要求，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和哈燕社在国学教育与研究方面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成为受霍尔基金资助的中国六所基督教大学之一¹⁰，其中每年经费由哈燕社负责调拨和监督使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则需每年向哈燕社提交包括经费使用情况、教学研究分工开展及其相关教学研究成果等情况的年度总结报告。

哈燕社的资金被分为常规费用和储备金两部分。常规费用每年调拨，用于当年的所务开支等，储备金则为常规费用透支填补之用，同时，若常规费用有余，则可积累进储备金以供以后紧急开支之用。在国学研究所建立之初，储备金所用较少，但每年都会被用掉一部分，如 1933-35 年，国学研究所储备金用量分别为：8071.86 元、9538.61 元、14877.07 元，¹¹此后，随着国际市场金价的下跌，哈燕

⁶ 转引自陶飞亚：《〈哈燕社〉补正》，《历史研究》，1999 年第 6 期。

⁷ 山东省档案馆藏齐鲁大学档案，以下简称齐档，J109-1-101，第 20 页。

⁸ 林济青，曾留美深造，1910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文学士，1917 年在利海（Lehigh）大学获工程学硕士学位，1919 年于齐鲁大学任地质学和经济学讲师，1930 年同时担任齐鲁大学文学院和理学院院长。

⁹ 齐档，J109-3-3，第 2 页。

¹⁰ 六所基督教大学分别为燕京大学、岭南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

¹¹ 1935 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30，第 16 页。

社基金收入随之减少，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实际收入也锐减，经费使用也渐显不足。如国学研究所收入从 1932-33 年的 29654.87LC 到 1935-36 年估计收入 16000.00LC，同样齐鲁大学的预算从 1932-33 年的 37600.00LC 到 1935-36 年的 16000.00LC。¹²这一情况非哈燕社所能控制，当时的许多教会大学情况都面临这一困难，因此，此后几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储备金一直处于赤字状态。抗战爆发后，国学研究所的工作虽一度停滞而当年常规费仍进入储备金，从而为此后在成都的重建和活动积累了资金。

此外，国学研究所若遇特殊需要还可以向哈燕社提出另外的资金申请。如在 1937 年年报中，国学研究所提出由于国学研究所所藏书目及收藏品的增多，图书馆规模显得过小，出现供不应求，因此在哈燕社社长叶绥夫¹³的应允下，向哈燕社董事会提交了一份 10000 美金的额外资金申请，用以建造一个国学研究所专用的建筑，以作为国学研究所职员专用的办公场所，并存放明义士大量的收藏品以及展示哈燕社资助下的各类各校出版物作品等。同时，国学研究所还提出增加 2500 美金以聘请在佛教和地理学研究方面的学者以增强国学研究所师资。¹⁴此后的年报中也多有因设备、搬迁等提及的这一类资金申请。

哈燕社的资金不仅仅是对国学研究所，即使是对齐鲁大学来说，哈燕社的补助也是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据朱式伦记载，1931-1932 年齐鲁大学收入预算中，哈佛燕京基金年息占到了学校预算总额的 66%¹⁵。因此，哈燕社大笔的资金为国学研究所，乃至齐鲁大学的业务开支、职员活动、宣传出版等提供了经济保障，也使哈燕社对国学研究所的发展和齐鲁大学的相关事务有了相当大的发言权。

在这一计划实施的最初几年，由于双方仅确认了合作方向的统一，而对细节操作并未作出具体规定，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对自身的工作尚握有较大的自主权，但随着哈燕社对其主导和监督意识的加强，两者因工作方向或利益上的某些差异，也引发了一些摩擦，这一点，后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发展。

¹² 1935 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30，第 18 页。

¹³ 叶绥夫 (Serge Elisseeff, 1889-1975)，哈燕社首任社长 (1934-1956)，生于俄国，东京帝国大学首位文学科西洋毕业生，后为法国汉学名家伯希和门生，通法英德语，纯熟流利，并可阅读汉语古籍。

¹⁴ 1937 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第 111-112 页。

¹⁵ 朱式伦：《齐鲁大学及其附属机构介绍》，载《20 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教育卷》，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河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0 页。

第二节 风雨飘摇二十年

国学研究所的运作，主要是利用霍尔基金“加聘师资”，在资金使用项下划出部分，根据“国文系规定之课程门类聘请学识丰富之学者为国文教授”。¹⁶与文学院其他非国学所教员相比，国学所教员教授时间适度缩减，以利其完成研究项目及教学讲义的编纂等工作。同时，划出部分资金作为学生学习国学的奖金或补助金，用于鼓励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以提供助学岗位的形式为学生提供助教、助研等实践机会，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国文程度，培养国学人才，做好专门研究的目标。¹⁷由此可看出，国学研究所在发展目标上是教研并重的。只是在不同的时期，教学与研究的比重会因条件、负责人管理风格的不同，及其与哈燕社关系等因素的作用而有所变化。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自1930年秋成立至1952年随齐鲁大学的撤销而正式解散为止，共延续了22年之久。期间，国学研究所几经变迁，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战前相对稳定发展时期（1930-1937）

国学研究所建立之初，齐鲁大学刚经过立案风潮的冲击，校长、副校长相继辞职，文、理学院虽已分开，但仍由林济青一人担任两院院长，稍后担任校长的朱经农、林济青、李植藩任期也都很短，整个学校的管理处于比较薄弱的状态。其时国学研究所的具体事务主要由栾调甫负责，而由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负责与哈燕社联络，对外和校际的联络工作则由两者及文、理学院院长 T.I.Linn 共同负责。¹⁸由于国学所是以文学院为基础建立起来，因而在开始阶段被视为文学院的从属机构，故其最初几年的年报标题自称均为“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出版的书籍中，編集所有者及页侧的标注也列名为“私立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如《国学汇编》第一、二册等。

此后，随着国学研究所的实力和影响有所扩大，其负责人在校内的身份或地位也渐趋升格。1935年，刘世传¹⁹出任齐鲁大学校长，并兼任文、理学两院的院长。在职期间，他不仅加强了对国学研究所的直接管理，还在1936年明义士回

¹⁶ 1941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济南），齐档，J109-03-11，第59-61页。

¹⁷ 同上。

¹⁸ 1934年6月23日，齐鲁大学明义士致哈燕社 Dr.George H.Chase 关于补充齐鲁大学国学所年报内容的书信，J109-03-11，第68页。

¹⁹ 刘世传（1893-1964），字书铭，蓬莱县温石汤村人，1905-1910年曾就读于登州文会中学和潍县广文大学政法系，1914年毕业于齐鲁大学，1924年取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35-1943年任齐鲁大学校长。

国休假后，直接担负起与哈燕社方面的联络，包括年报的送发、内容的调整等。这一做法此后被历任校长所传承，国学研究所的所长一职也开始由齐鲁大学校长兼任，但其并不具体负责所内事务。相应地在国学研究所另设主任一职，由所长决定聘请或任命，具体负责所内日常事务及发展规划，在所内有很大的自主权，一般邀请著名学者担任。这一变化，表明国学研究所在齐鲁大学内部地位已有所上升，不再是文学院的附属机构，而是作为校内的一个独立研究机构了。此后，国学研究所年报的标题称呼及出版书刊所用标注等也都开始改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栾调甫上任后，积极扩充所内人员，在管理、教学和研究等各方面的改进上也时有进步，使国学研究所在此期间发展迅速。根据哈燕社的资助要求，国学研究所最初确定的工作目标有两个：一是齐鲁文化研究；二是提高本校学生国文素养，加强国学教育。从研究所 1932 年向哈燕社提交的年度报告看，开始参与这些工作的在所基本成员仅五六个人，至 1932-33 学年，在所人员达到了 17 人。²⁰随着所内人员的不断充实，研究所的影响不断扩大，研究工作进一步展开，许多研究成果受到了学术界的肯定，提高了研究所的地位，也使齐鲁大学在中国文化教学与研究方面的状况大为改观，达到了其最初建所的目的。1936 年，栾调甫去职，²¹继任者马宗芑²²在所内事务的运作等方面大体延续了栾的基本思路。但不久，便因抗战爆发而致研究所的工作几陷于停顿。

应当指出，由于齐鲁大学原先的国学教学力量底子甚薄，它的组建是在某种外界因素的触动下开展起来的，因而在成员的构成、发展的基础和条件等方面，均难以和地处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燕大和辅仁等教会大学相比，由此决定了在其建设规模、研究的成就和深度等方面，都与当时国内新国学研究的前沿水准存在着相当的差距，这具体表现在，抗战前所内不少研究人员等仍保留着较浓厚的传统色彩，在研究理论、方法和内容上显得比较陈旧，为数不多的几位新式学者如舒舍予(即老舍)、马彦祥²³等也来去匆匆。因此，国学研究所的建立，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齐鲁大学的中国文化教学与研究，但从抗战以前的总体情况看，

²⁰ 1934 年 6 月 23 日齐鲁大学明义士致哈燕社北平办事处首任总干事博晨光 (Lucius C. Porter) 关于补充 1932-33 学年度报告内容的书信，齐档，J109-03-11，第 59-64 页。

²¹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 1937 年年度报告，齐档，J109-3-11，第 109 页。

²² 马宗芑 (1883-1959)，字竞荃，辽宁开原人，1909 年己酉科拔贡，次年考取法官，1917 年北京大学毕业。

²³ 马彦祥 (1907-1988)，浙江鄞县 (今宁波) 人，原名马履，字燕翔，笔名凡鸟、尼一、斯人等，生于上海，著名金石古器物学家马衡之子，戏剧作家，导演理论家。

其进步和成绩仍是有限的。

也许正因如此，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并不受哈燕社的重视。1934年，叶绥夫出任哈燕社社长，经过对各院校的考察对比后，于1936年2月制定了协调哈燕社与有关教会大学关系的计划，希望在这些大学中作一些分工。1937年叶绥夫在访问齐鲁大学时反复强调这一计划，希望按照哈燕社的协调计划，强调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宗旨应为所有学生学习国学打好基础，应该注重本科教育，至于研究的任务则应由燕京大学等有能力的大学去做。但齐鲁大学对此显然感到难以接受，在此后国学所给哈燕社的报告中，曾几次三番提出了国学所的人员应该以一半时间教学、一半时间研究，而且保证要将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²⁴。对此，哈燕社始终不以为然，这一工作方向上的分歧，后来一直成为哈燕社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相互摩擦的导火线。

二、抗战中的兴衰（1938-1945）

抗战爆发，济南沦陷，齐鲁大学于1938年被迫西迁四川成都。此后几年，校舍飘泊，人员多变，国学研究所也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此期，由于哈燕社对资金使用管理较前加强，还直接导致了两者在资金使用、国学研究所发展的重心等问题上分歧凸现。这些分歧，自然对其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试图跻身国内学术前沿展开的种种努力。

齐鲁大学迁至成都之初，因图书、仪器等都未能随之转移，师生也“早已散处各方，一时不易招致”，²⁵国学研究所也显得零落不堪，教学研究皆处于停顿状态。直到1938年夏，齐鲁大学才借助华西大学空地建造起战时校舍，在成都复校。不过由于哈燕社的拨款仍然照常，在整个学校工作一度停顿的情况下，其经费反而有所积存。因此，复校后的齐鲁大学立即开始积极筹划国学所的重建工作，而原来留在济南的部分国学研究所人员也陆续赶来汇合。鉴于战争中很多教育机关都迁往大后方，齐鲁大学复校所在的成都，当时学者云集，是抗战时期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之一，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重建提供了人才资源。1939年5月，学校以优厚条件聘请了顾颉刚为国学研究所主任，急欲作为一番。

顾颉刚当时任职于云南大学，对昆明的条件并不满意，一来云南地处高原，身体不适；二来内地文化机关大多迁到昆明，交际不胜其烦，“此间有北平之坏

²⁴ 1937-41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第110-111页。

²⁵ 《齐鲁大学校友通讯录》，第一期，民国二十八年四月，第5页。

处（熟人多），而无其之好处（材料多）”²⁶。因此，在得到齐鲁邀请后，考虑到此举颇可避免过多交际而静心学术研究，顾颉刚遂决定应聘，并建议利用霍尔资金，广邀深富学识之士为国学研究所“撰文著书”，以提高国学所地位，同时“为吾国学术界奠定集体工作之基础”，并推荐国学研究所聘请钱穆、汤用彤等人入所研究，以及利用部分哈燕社经费，与北平研究院合作考察滇西事宜等设想。²⁷这些要求和提议得到了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的认可。²⁸1939年9月，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开始工作，未随校迁移的所员，如周幹庭、张立志、王敦化、曾毅公等人则继续在济南旧址专做研究工作，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占领校园后解散。

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最初全部设于华西协成大学校园男生宿舍内，后因此处地狭人多，且空袭频繁，乃将所购有价值的图书移往成都北郊36里的崇义桥赖家花园。这是一个环境很好的私人住宅区，地静人稀，市嚣不侵，非常适合研究工作，租金也比较合理。经过改造后，研究所大部都搬了过去。但由于此处离校园太远，因而研究所仍留两间办公室在原驻地男生宿舍内，一切对内外事务仍在校内办理。²⁹

顾颉刚上任后，按照原先的设想，利用齐鲁大学比较稳定的经费来源，广邀国内学术名流到所工作，大大改变了战前在济南时局促于地方的狭小局面，研究内容也大为改观，社会影响不断提升。此外，他还设想在提高现有师资水平的基础上设立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提升学校的学术层次，其事虽因故未能通过教育部批准而不得不中道而辍，但仍显示了该所在这一时期的良好发展势头，并表明由于战争时期学生较少等原因，对于国学研究所这样的机构，教学相对于研究而言已经放到了较为次要的位置。

但顾颉刚的这些措施与哈燕社的一贯要求显然不符，因而引起了后者越来越多的不满。叶绥夫自1939年12月起，在致齐鲁大学的多封书信中，对国学研究所的批评远远多于肯定。试图设立文科研究所之事，更令哈燕社感到不能容忍。1942年12月4日叶绥夫致信刘世传，明确指出齐鲁大学“除非专修课程组织完善，教学质量崇高”的条件具备，否则“不应从事研究工作”，而“违反本社董

²⁶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页。

²⁷ 1939年7月，顾颉刚致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书信，齐档，J109-03-2，第55-61页。

²⁸ 1939年7月，张维华致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书信，齐档，J109-03-2，第62-63页。

²⁹ 1940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第194页。

事会政策及未和本社商量就组织的国学研究所开支太大”，已经“大大的越出教务费用所占的比例”，故齐鲁大学应该“裁减研究人员”³⁰。不仅如此，哈燕社对顾颉刚本人也颇有微词。如1940年12月10日叶绥夫致顾颉刚信中要求顾颉刚解释接受哈燕社1932年4月资助2000美元进行的《尚书》研究项目为何迟迟未见成果，顾如不能如期完成，让哈燕社看到成果，就应退还经费。³¹1946年1月4日叶绥夫在写给纽约齐鲁大学董事会的信中还表示，顾颉刚虽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学术事业推动者，但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学者。³²在这种情况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虽然极力想通过各类途径提升自身的地位，但终因其对哈燕社经费存在着很大的依赖性，而不得不做出调整。

对顾颉刚而言，哈燕社的指责也不会令其愉快。此后，顾虽仍以部分时间在国学研究所内负责工作，但已逐渐将精力转向重庆方面的学术活动。1942年4月顾颉刚正式辞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之职，将工作重心转向中国历史学会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而由钱穆接任国学所主任。

钱穆上任后，接受哈燕社的要求，在国学研究所内进行了大手术，使国学研究所较顾颉刚在任时发生了很大变化。1942年国学研究所在给哈燕社的年度报告中分析了过去三年的工作，检讨了与哈燕社宗旨不符的方面，随即提出了自身的改进方案，决定中止资助校外学者进行研究的计划，同时削减所聘人员，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教学方面，重点加强课程建设，增加授课时间。此后至1943年秋，国学研究所内仅有三个教授（包括顾颉刚），两个副教授，一个图书管理员，一个文书和一个学生助理，所内教师除钱穆因担任主任，允许每周仅上六节课外，其余人员的授课任务都有很大增加。³³又因所址赖家花园离校太远而不利教学，遂将人员和书籍大部迁回校园，附设于华西大学事务所楼上。这些措施使国学研究所在教学上确实大有改观，但也为此付出了缩减原有研究规模的代价。这一报告自然受到了哈燕社的肯定，认为这一时期齐鲁大学在完成计划任务是积极努力的，有了“一个较为平衡的计划”³⁴。

钱穆的改革措施不仅适应了哈燕社的要求，在当时战乱的条件下，也可以说

³⁰ 齐档，J109-01-102，第36页。

³¹ 齐档，J109-01-101，第221页。

³² 齐档，J109-01-102，第39页。

³³ 1943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致哈燕社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第242-247页。

³⁴ 1945年12月9日哈燕社叶绥夫致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书信，齐档，J109-01-102，第36页。

是迫不得已。对于齐鲁大学这样一所小型综合性大学来说，顾颉刚时期的拓展性国学研究，固然对提高齐鲁大学的社会威望大有好处，并有前一时期积累经费作为支撑，但如长期这样操作，按齐鲁大学当时的经济实力，显然难以为继。

虽然如此，哈燕社仍嫌不足，他们要求齐鲁大学停止所有的研究工作，一意教学，这使齐鲁大学深感为难。盖齐鲁大学本是一所规模不大的教会大学，特别是当其借处异地办学，没有更多的条件去吸引学生或争取社会的认同时，通过国学所的研究以提高其学术含量和社会影响，其中包含着相当实际的考虑，这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这方面完全听从哈燕社的指挥而在操作中总会表现出一定的独立意愿。

三、战后维持期（1946-1952）

1945年8月吴克明³⁵就任齐鲁大学校长后，试图重新加强国学研究所的力量，在给哈燕社的信中，他表示将在二年内聘请一批“第一流的学者在齐大国学研究所内工作”³⁶，包括吴金鼎、丁山、彭举、常乃惠等。对于这一设想，叶绥夫表示十分不满，在他们看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应“予以废除”，以使用节省的经费加强本科教学，如齐鲁大学在下一学年前不作彻底改进或不按哈燕社的政策制定课程计划，将取消其经费拨款。³⁷在同时发给纽约齐鲁大学董事会的书信中，叶绥夫还表示，哈燕社的资助是要在齐鲁大学内“造就一个专修水准有力的中文系”，而“不是来帮助学者的研究计划”，但齐鲁大学中文系“从未坚强过”，这不能不使哈燕社董事会“万分失望”。³⁸

在这种情况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一直难以施展，研究人员常乃惠和丁山等先后辞职。1946年国学研究所随校迁回济南，代理主任吴金鼎被正式任命为主任。面对哈燕社一再要求齐鲁大学取消国学所的威胁，吴克明解释说，国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其实仅存主任吴金鼎一人，而吴还担任着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文学院代院长，并负责一些教务工作，国学所的工作只占用了他一小部分时间。同时，国学研究所握有一些书籍及原稿的版权，立即取消似有不妥。³⁹但哈燕社不为所动，他们甚至对齐鲁大学在年报中仍然使用“国学研究所”的称呼

³⁵ 吴克明（1898-1977），青州市益都镇偶园街人，1919年济南齐鲁大学毕业，美国欧柏林大学硕士，1945年起担任齐鲁大学校长。

³⁶ 1945年8月14日，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致哈燕社叶绥夫书信，齐档，J109-01-102，第33页。

³⁷ 1945年12月9日，哈燕社叶绥夫致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书信，齐档，J109-01-102，第36页。

³⁸ 1946年1月4日，哈燕社叶绥夫致纽约齐鲁大学董事会诸位先生书信，齐档，J109-01-102，第39页。

³⁹ 1947年1月17日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致哈燕社叶绥夫书信，齐档，J109-01-102。

而感到“万分的震惊”，重申齐鲁大学废除研究所乃“义不容辞”，并表示“在再拨付经费以前，我们须有国学研究所不再存在的肯定证明”⁴⁰。在哈燕社的强硬态度面前，齐鲁大学不得不做出实际行动，吴克明在 1947 年给叶绥夫的书信中明确表示国学研究所“于一年以前已取消了……该部门现今的正式名称是中文系”，之所以还用“国学研究所”的名称，是因为“我想名称不若我们真正做的工作般重要，同时我用惯了该名称……请不要认为我们再有任何从事研究工作的思想”。⁴¹

至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名义上被取消，而在实际工作中，哈燕社经费仍在拨付，齐鲁大学内部管理仍将哈燕社资助国学教学的人员划出管理，而给哈燕社的年度报告也仍在继续，国学研究所回到济南后聘请的人员也仍在所工作，由哈燕社经费支付工资。所不同的是，这时由哈燕社经费支持的研究事项几乎全部被取消，所内人员负责的是面向文学院，甚至是整个齐鲁大学在校学生关于中国历史、语言、文化等方面的课程教学，研究成了职员个人的事情，因此，教学成为这一时期被强调的唯一重点。

1948 年，国学研究所主任吴金鼎去世，由张维华继续其关于原国学研究所的工作。张维华早年毕业于齐鲁大学，毕业后多年在国学研究所内工作，对所内状况及与哈燕社的关系比较了解，因此上任后积极协调齐鲁大学与哈燕社关系，适应哈燕社要求，调整课程，加强图书馆建设。同时因为局势变动，特别是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哈燕社要保持与中国各教会大学的联系，过于强硬的态度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因此可以感觉到哈燕社这时对齐鲁大学的限制也不似以往强硬。这使齐鲁大学得以在适度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适应变动局势的需要，增添课程等。

但此时的局势发展已令国学研究所人员无法静心实施自己的发展计划了。1948 年济南解放前夕，齐鲁大学文、理学院在校长吴克明的带领下迁往杭州灵隐寺零散上课，直到 1949 年夏浙江解放后才陆续迁回。新中国成立后，齐鲁大学于 1949-1950 年一度停止招生。而随着朝鲜战争爆发和中美关系的决裂，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向中国汇寄资金，齐鲁大学遂在经济上陷入困境，不久即由政府接

⁴⁰ 1946 年 12 月 10 日和 1947 年 12 月 17 日，哈燕社叶绥夫致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书信，齐档，J109-01-102，第 59 页。

⁴¹ 1947 年 12 月 23 日，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致哈燕社叶绥夫书信，齐档，J109-01-102，第 106 页。

管。1952年，根据中央改造调整旧大学的方针，齐鲁大学校名撤销，各院系被调整到其他大学，文学院文史专业在调整前早已停止招生，剩下的少数师生被并入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学院，国学所成员从此各奔东西，“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遂成一历史之名词。

第二章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建制与运作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建立，是当时学术界国学思潮涌动的产物。但在建制上，它既不同于北大国学门的科研本位式体制，也与偏重研究生教育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燕大国学所有别，而是一个以研究促进本科教学为主旨的机构。其运作大体上也是围绕着这一目标展开的。

第一节 师资结构及各项基础建设

推进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和教学水平，关键在于师资。栾调甫清醒地看到了齐鲁大学原先在这方面的弱点，故受命伊始，立即提出一份师资组合名单，由林济青亲自出马聘请。从有关材料看，国学所专职人员的编制甚少，以抗战前而论，最初仅研究员李云林及助理员胡立初从事历史地理研究，栾调甫及助理员彭翔生从事先秦诸子研究。稍后又聘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为专任研究员，从事甲骨文和上古史研究，同时接替年高体弱的李云林继续历史地理研究，⁴²配以朱宝琛(仅在1934年任职五个月)、李湧泉等助理研究员。再加图书管理员张竣明、出版校对员许慕贤，以及1936年继栾调甫为主任的马宗芑等。其余多为本校他系兼职教师，如国文系的郝立权⁴³、舒舍予、慈丙如、齐树平、周幹庭、许炳离、马彦祥，社会学系的张锡嘏、胡道远、范迪瑞、皮松云，社会经济系的余天麻，历史政治系的张立志、赵振之、张维华等。⁴⁴这些人员，按其专业分为社会、语言文字、哲学和历史地理四组。

从这些人员的结构看，国学研究所前期的师资有以下三个明显特点：1、外籍教师(三人)和有国外留学背景的(六人)占了不小的比例。2、人员以兼职为主，

⁴² 《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1932年11月5日，齐档J109-03-3。

⁴³ 郝立权(1895-1979，一作1978)江苏建湖(一作盐城)人，字秉衡，又字曷衡，一作曷衡。192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任昆明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太炎文学院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大教授，著有《何水部诗注》《谢宣城诗注》《阴常侍诗注》《文心雕龙注释》《中国文学史》等。

⁴⁴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四、第五年报告书，齐档J109-03-3。

教学与研究并重,这一状况与齐鲁大学办学规模、实力和研究所的目标制定相关。

3、师资总体水平不高,当时国学研究领域的一流专家几乎没有,与燕京、辅仁等同是教会大学的师资力量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这表明齐鲁大学为一所小型综合性大学,虽然经多年发展,在这方面仍然偏弱。

直到顾颉刚担任国学所主任时期,情况才有了较大改观。在顾的擘划下,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一时人才荟萃,聘任的师资包括吕思勉、钱穆、汤吉禾、胡厚宣、张维华、孙次舟、张维思、王育伊、蒙思明、韩儒林等。成员中不但顾、吕、钱皆无愧国内一流学者之称,即稍年轻一些的韩儒林、胡厚宣、蒙思明等也已多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应当指出,这种局面的转变,固然与顾颉刚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以及抗战时期许多高层次专业人才流向四川所提供的客观条件有关,但齐鲁大学在师资聘用上采取的灵活举措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根据顾颉刚的建议,实行了资助研究员制度,具体细则为,国学研究所利用部分哈燕社经费,资助一些所外愿与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合作的知名学者从事相关研究和著述,并由国学所的名义出版其研究成果,或将其论文登载于《齐鲁学报》。参与这项合作的学者当时主要集中于上海及其周边地区,到1943年,接受资助研究的著名学者至少达15名,⁴⁵如吕思勉、容肇祖、童书业、赵泉澄等皆接受过这方面的资助。这项计划的推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国学研究所的声誉和影响,“亦为吾国学术界奠定集体工作之基础”。⁴⁶但由于与哈燕社对经费使用的规定存在着冲突,因而遭到了哈燕社的激烈反对,为此不得不于1943年9月1日终止实施。⁴⁷与此同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还请吕思勉担任了代理人,负责在上海为其购置图书和照料开明书店出版各类专著和《齐鲁学报》,以及联系资助研究人员等事。并在资助研究计划终止以后,仍保留了此制。⁴⁸这一制度,对加强抗战期间远迁内地的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与国内学术界的联络起了相当的作用。

其次是充分运用了名誉研究员的制度。设立名誉研究员,是当时国内研究机构比较普遍的做法,不过,抗战前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仅聘任过王献唐等少数人员到所讲课,且并不领取报酬。到成都后,由于当地集中了不少高校和相关学者,

⁴⁵ 1941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 J109-03-11, 第209-211页。

⁴⁶ 1939年7月,顾颉刚致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书信,齐档, J109-03-2, 第56页。

⁴⁷ 1943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 J109-03-11, 第243页。

⁴⁸ 同上。

为了更好地利用这一人才资源，齐鲁方面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增聘了不少名誉研究员，如三台东北大学之蒙文通、丁山、萧一山、金毓黻教授，华西大学之闻宥、吕淑湘、杜奉符、韩儒林教授，金陵大学之刘国钧、李小缘、商承祚教授，四川大学之冯汉骥教授等都被列入了名誉研究员名单。从而使之在较短的时间，得以用社会人才资源弥补了自身办学条件上的某些弱点。

此外，这一时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还采取了比较宽容的用人政策，如钱穆同意受聘时正拟回家乡省亲一年，经顾与齐鲁大学商定，允先付一年薪金及工作经费(包括助手费及资料费等)六千余元，俾其在苏州为国学所编辑《齐鲁学报》和《中国历代地理沿革图》。⁴⁹对于顾颉刚，齐鲁大学方面更是信任有加，凡所内人事、经费和工作计划，一任其决定。⁵⁰这种尊重人才的姿态，无疑也增加了对学者的吸引力。

在注重师资建设的同时，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还加强了其他一些基础性的设施。首先是图书资料的建设。国学研究所甫一建立，林济青在去北京加聘师资的同时，即大量搜购图书改善图书馆状况。据郭查理所记，林济青 1930 年去北京，“购进了一大批中国古籍，其中有一些是珍本，他买的书共 2810 种 32400 卷。此后还购进了一些书，所以在这一年里，图书馆的藏书达到 6 万册”。⁵¹此后，国学研究所几乎每年的经费预算都有图书收购一项。

就整体的图书馆建设情况来看，国学研究所前期在济南时的成绩最大。这一时期藏书除 1934 年未有收购外，每年数量都有或多或少的增长。到 1937 年学期结束时，图书馆的藏书量保守估计也超过了 12 万册，其中大部分为利用哈燕社经费购得。此为图书馆储藏量最为丰富的时期，据《中华基督教年鉴》统计，至 1936 年，齐鲁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即已列居全国第四位。⁵²在藏书量增加的同时，图书馆也相应增加了图书管理与阅览功能，国学研究所的图书购进后即进行分类整理及编目。编目以书籍内容性质划分，一般分为通俗读物、哲学类、宗教类社会学类、语言文字学类、自然科学类、工艺类、美术类、文学类、历史地理类十种。为所内教研使用计，该所内还聘请了专门的编目员等专门管理图书。

⁴⁹ 顾颉刚致刘世传函，山东省档案馆藏档，J109-03-2。

⁵⁰ 刘世传复顾颉刚函，同上。

⁵¹ 郭查理：《齐鲁大学》，陶飞亚、鲁娜译，珠海出版社，1999 年版，第 172 页。

⁵² 《中华基督教年鉴》(13) 第 278、285-291 页。转引自《民国山东通志·宗教志》第四册，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出版，民国九十一年九月十二日，第 2102 页。

抗战中齐鲁大学西迁，图书资料并未随往，经一段时间的重新购置，据 1940 年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载，已有中文图书 11137 册，其中还有不少为珍本。更重要的是，此时国学研究所得到了当地藏书家罗氏的支持，允将其 20000 余册藏书免费移交国学研究所使用，直到离开成都时归还。此外，国学研究所还可借用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等校的图书馆，并订阅了 15 种中文杂志，买了一些地图。从而为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基本条件。抗战胜利以后，齐鲁大学迁回济南，在这一过程中，图书资料损失比较严重，达 20000 余册。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由于物价上涨，而国学研究所经费不甚充足，图书增长很少。以后渐得恢复，藏书量一度达到 118000 余册。

在图书收购之外，国学研究所为收藏展示部分古物而建立的陈列室也是其一项重要贡献。该室由青岛市市长沈鸿烈赞助 1000 元和校方投入 400 元，于 1933 年建立，⁵³附设于校图书馆一楼东部，约占屋五间，内置玻璃橱若干，用以陈列自史前至宋代的石、陶、骨、铜、瓷器等，尤以史前时期及汉代陶器居多。陈列室建设的宗旨据栾调甫所述为“便利于教授，兼使全校学生于一览之下即可明了中国文化之变迁，非寻常展览者”⁵⁴。陈列品最初多借自研究所内明义士和齐树平的个人收藏，也有少量属研究所所有，后续有增添。

明义士回加拿大后，其部分收藏品仍存放所内，并由国学所付给一定的物质回报⁵⁵。此后抗战爆发，陈列所物品同样未能随员西迁而存放于济南。直至 1947 年国学研究所重回济南时取出，其中大多尚属完善，惟明义士之甲骨片，因受潮有所损失。以后续加添置藏品，至 1949 年，其收藏已达 945 件之多，包括书画、拓片、瓷器、铜器、陶器等。

图书资料、古物收集等基本建设的加强，对研究所各方面日常工作的开展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首先，对国学研究所本身来说，图书与收藏品的增加为其进行教学与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而对齐鲁大学来说，国学研究所第一年添购的图书即使其图书馆藏书量增长了近两倍，藏书规模符合了教育厅立案视察团在视察时向齐鲁大学图书馆提出的要求，使齐鲁大学于第二年即顺利通过了立案申请。同时，国学研究

⁵³ 1934 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第 31 页。

⁵⁴ 同上。

⁵⁵ 1938 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第 152-153 页。

所添置的图书不仅对国学研究所内人员开放，还面向全校，因此，为校内学生的学习提供了方便和条件，更为齐鲁大学在山东乃至全国博得了美誉。

其次，对此后的学术研究来说，国学研究所在此期间的收购使大批极富价值的书籍珍本及古物被保存了下来。如国学研究所对山东地方志的收集及保存，到1936年，该所几乎收集到了山东所有地区的地方志，经过详细梳理，进行了编目、制作卡片等，并为其制作了封套保存。不仅是山东一省，其他省市的地方史书，研究所也多有保存，据1935年年报统计，图书馆当年收集到的志书数目达到了726部9613卷，丛书达到22338种，并都进行了系统编目，制作了子目通检和一万多张目录卡片，这些都是进行北方诸省社会、历史和农村等方面调查研究所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料。此外，明义士数量众多的甲骨收藏也大多保存在了国学研究所内，同时还有其他许多极其珍贵的古代文物，包括石器时代的用具如石针，以及一套比曲阜孔庙说存更为完整的古编钟等⁵⁶，这些对学术研究、文物保存等都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节 课程设置与国学教育

国学研究所建立的主要目的即为提高本校学生国文素养，培养专门研究人才，因此，教学在其整个工作中占据了很大比重。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初创时，开设的国学课程并不多，主要“讲授研究国学之基本知识，间亦指导本系(指国文系)学生试作初步研究之实习。”为更好地加强三、四年级学生“研读古书方法与国学基本学识”的训练，他们还组织编写了《名学讲义》、《经学概论》(以上栾调甫)、《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陆士衡诗注》(以上郝立权)、《文学概论》、《文艺批评》(以上舒舍予)等教材。⁵⁷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充实，至30年代中期，整个课程设置已颇具规模，以1934-1935学年为例，其开设的课程包括：⁵⁸

⁵⁶ 宋式伦：《齐鲁大学及其附属机构介绍》，载《20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教育卷》，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河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⁵⁷ 《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山东省档案馆藏档，J109-03-3。

⁵⁸ 据《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第五年报告书》，同上。

上学期			下学期		
课程名称	学分	主讲人	课程名称	学分	主讲人
杜威教育学说	3	慈炳如	金石研究	3	齐树平
哲学概论	3	慈炳如	墨子	3	栾调甫
中国近代思想史	3	慈炳如			
逻辑	3	慈炳如			
普通心理学	3	慈炳如			
美学	3	慈炳如			
古今文选	3	郝立权	古今文选	3	郝立权
中国文学史	2	郝立权	中国文学史	3	郝立权
文字学	2	郝立权	文字学	2	郝立权
修辞学	2	郝立权	专家诗	2	郝立权
中国美术史	2	齐树平	中国美术史	2	齐树平
国学大纲	3	齐树平	国学大纲	2	齐树平
戏剧原理	3	马彦祥	戏剧作法	3	马彦祥
文艺思潮	3	马彦祥	文艺思潮	3	马彦祥
文学概论	3	马彦祥	小说原理	2	马彦祥
古今文选	6	周幹庭	古今文选	3	周幹庭
说文	2	周幹庭	说文	2	周幹庭
诗选	3	周幹庭	诗选	3	周幹庭
中国历史纲要	3	张立志	两汉史	3	张立志
中国古代史	2	张立志	中国历史研究法	2	张立志
明清史	3	张立志	正史概论	2	张立志
东北史	2	张立志	中国近世外交史	3	张立志
日本史	3	张维华	中国史学通论	2	张维华
中国沿革地理	2	张维华	中国沿革地理	2	张维华
近世中欧交通史	2	张维华	近世中欧交通史	2	张维华
教育概论	3	范迪瑞	家庭社会学	3	范迪瑞
社会学导论	3	范迪瑞	社会演化	2	范迪瑞

社会问题	2	范迪瑞	农村生活概论	3	范迪瑞
------	---	-----	--------	---	-----

这些课程，重点面向文学院，同时也对全校学生开放，基本都被列为选修课，仅有个别学科，如中国文学等科目被列为必修课而向包括文学院、理学院和医学院预科班的学生讲授。从内容看，除文史哲等传统学术外，还涉及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美术等现代新知识，但总体来看，组合比较松散，缺乏系统性和前沿性。几位较有生气的学者在国学研究所内也是来去匆匆，未能改变教学主导氛围，如舒舍予在国学研究所任教三、四年后即离开，其继任者马彦祥更是匆匆一年多即离开，张维华 1934 年方入所，1936 年即追随其师顾颉刚离去。而这一时期齐鲁大学开设的甲骨文等课程，虽拥有明义士等人的大量甲骨实物收藏，但研究仍有待深入，其教学内容也仅在引导学生了解甲骨文的基础知识而已，专才培养尚无从谈起。

尽管如此，这些课程对齐鲁大学的国学教学仍起了相当的推进作用，并“已引起学生研究之兴趣，增进其国学之注意。故本系学生初仅五人，现已增至十一人，即其他各系学生选修国文课者，亦较往年加多矣”。⁵⁹到 1934 年则增为 23 人，⁶⁰每学年选修国学研究所课程的学生时有超过千人的情况。此外，在教学引导上，国学所也做过不少有益的尝试，如后期吴金鼎和胡厚宣曾在教学中尝试引导学生建立中国文学、历史、哲学和其他科目方面的兴趣小组，特别是由学生组织的文学社，在提高其学习和文学创作兴趣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其时文理学院还编刊了小册子，以发表学生的相关作品，并有当地报纸为他们开通了专栏登载，其影响可见一斑。⁶¹

国学研究所在本科教学方面提高层次较快的当为 1943 年钱穆主持所务前后。这一时期，先后有顾颉刚讲授上古史，钱穆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胡厚宣讲授殷商史等，张维华在这一时期也随顾颉刚回到国学研究所讲授中西交通史，授课内容新颖，注重传授新知识、新方法，且有一定的深度。钱穆继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后，进一步改良教学计划，集中国学研究所力量在教学课程安排上，增加职员的教学任务，课程科目进一步被多样化，针对实际问题开设具体科目。如针对国文系和历史系的不同情况，在国文系中增加了更多

⁵⁹ 1932 年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第二年报告书，齐档，J109-03-03，第 9 页。

⁶⁰ 1933 年 11 月 18 日齐鲁大学明义士与哈燕社 Dr.George H.Chase 关于补充齐鲁大学国学所年报内容的书信，齐档，J109-03-11，第 56 页。

⁶¹ 1947 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第 282 页。

关于中国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课程,在历史系则更强调中国古代史和现代史的学习与研究。另外,授课时间也大大增长,学生听课人数更是成倍增长,国学研究所的教学无论在教学内容还是效果上都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但这一鼎盛时期在国学研究所二十余年的发展延续中仅为昙花一现,很快便因时局动荡等原因被打断。虽然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学研究所迁回济南,将教员几乎全部的工作精力都投入到了教学上,但终因时局动荡而效果不显。

教研互长,本属常理。但国学研究所因环境所迫,对两者的力量分配时常处于矛盾状态。最初,国学研究所内职员尚能大体在两者间保持一种平衡。后来则在哈燕社的压力下,不得不更多地将重心转向本科教学一边。抗战中,国学研究所进入成都,随着顾颉刚、钱穆、胡厚宣等著名学者纷纷加盟,曾有心在研究方面大展宏图,但这一情况未能维持多久便引起了哈燕社的强烈反对。此后在钱穆的主持下,工作重心复转向本科教学,当时除钱穆作为研究所主任外,其他全职职员的教学时间都几乎占到了他们 2/3 的工作时间。⁶²但这一安排仍不能令哈燕社满意,最终迫使国学研究所在 1946 年以后,将全部的工作都投向了本科教学。

第三节 研究生教学的尝试

抗战期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因其师资队伍层次的提高,还一度开始尝试研究生的招生培养。战乱中,许多学校被迫停办或搬迁不定,整个国家的教育事业遭到了极大困难。同时,国民政府为阻止战时资金的外流也不鼓励学生到国外留学,由此给国内学生的继续深造带来了很大不便。针对这种情况,教育部向国内各高校发布了鼓励研究生培养的指令,要求有条件的高校开设研究生课程,经批准后由政府提供支持和补贴。

齐鲁大学在济南时因自身条件所限,并未招收研究生。但在成都重建后,因顾颉刚、钱穆等人的加盟,实力大增,慕名前来要求深造的高校毕业生日益增多。由于当时受哈燕社资助的教会大学中,仅有燕京大学和金陵大学有招收研究生的资格,而研究生的培养本身即是对学校教学和研究水平的认可,无疑对充实学校财政、师资,提高其社会声望大有帮助,并为学校带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因而齐鲁大学对此颇有跃跃欲试之意。1940 年,经国学研究所主任顾颉刚提议,

⁶² 1943 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 J109-03-11, 第 243 页。

齐鲁大学决定向教育部正式提出建立文科研究所和招收研究生的申请报告。

1940年5月，教育部派徐诵明、陈泮藻到齐鲁大学视察，齐鲁大学校方遂将其招收研究生的计划当面作了汇报，见未遭回绝，遂于当年暑假拟定各种立案材料的同时着手招收研究生。

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齐鲁大学决定先成立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并制定了《暂行组织规程》，确定建所宗旨为“研究文科高深学术，并集合员生共同担任文史研究及编辑工作”。⁶³在管理上，文科研究所仿照国学研究所，设所长一人，主持所内重要事务，由校长兼任；设主任一人，主持所内全部事务，聘校内教授兼任。师资方面，“凡本校国文及历史社会两系之教授讲师，均得聘为本所研究生导师”⁶⁴，其他院系的教授讲师中，如有对文史研究有兴趣而又学有专长者也可聘为导师。另外，研究所还计划招聘若干校外专家为名誉导师，以辅助校内研究生培养工作，充实师资。其研究生培养科目分为四组，以便学生根据各自的爱好及条件选择主攻方向，具体分工如下：

- 一、断代史组，包括殷商史(胡福林)、西周史(孙次舟)、东周史(顾颉刚)、战国史(钱穆)、魏晋南北朝史(吕思勉)、宋史(王育伊)、元史(韩儒林)等研究方向。
- 二、分类史组，包括中国民族史(吕思勉)、中国疆域沿革史(钱穆)、中国政治制度史(汤吉禾)、中国社会史(蒙思明)、理学史(钱穆)、满蒙史(张维华)、中西交通史(张维华)等研究方向。
- 三、古籍校订组，包括古声韵(张维思)、甲骨文(胡厚宣)、金文(孙次舟)、《尚书》(孙次舟)、《春秋》及《左传》(顾颉刚)、《史记》(顾颉刚)、《竹书纪年》(钱穆)等研究方向。
- 四、通习组，包括史学方法论(韩儒林)、史学名著选读(顾颉刚)、史学材料实地采习(王育伊)等研究方向。

在设备、师资、组织、培养方案基本就绪后，齐鲁大学文科研究所即于当年暑假面向社会招生。文科研究所拟定生源为各国立、省立及立案之私立大学、独立学院或国外大学的毕业生中“有研究历史之素养者”，入学须经考试，入学后不需交纳学费、生活费等，有特殊情形的还可以经所务会议讨论后减免或豁免其

⁶³ 私立齐鲁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暂行组织规程，齐档，J109-03-08，第39-41页。

⁶⁴ 同上。

它费用。此外，国学研究所还向每位研究生提供每月 30 元的生活补贴。研究生攻读硕士学位须至少修满规定课程四十个学分，并修业年限不得少于两年，入学半年即需提出论文题目，经所务会议讨论后为其指定导师，以进行专题研究。⁶⁵经两次招生后，所内录取了 15 名研究生，但由于远道交通不便等原因，到 1940 年 10 月，仍有 4 名未能到校注册。已注册的 11 名研究生中，5 名来自四川大学，2 名来自齐鲁大学本校，另有 4 名则分别来自云南大学、西北大学、华西大学和湖南大学。在研究方向上，则以专修分类史组的最多为 6 人，断代史次之 4 人，另有一人选择目录学作为专修方向。⁶⁶

虽然研究生招生、培养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开展了起来，但此项计划在教育部立案和哈燕社两方面都遭到了阻力。

1940 年，教育部督察齐鲁大学两个月后，校长刘世传即将制定的文科研究所组织章程、本校师资情况、所拟定培养运行情况等一并呈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要求准予立案，并写信给当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的顾毓秀，恳请其鼎力支持，⁶⁷但却未被批准。顾毓秀在给刘世传的复函中称，教育部目前希望先尽快充实原有研究生招收资格的各大学研究院所，当年暂不增设研究院所或于原研究院所增加学部，“本年度各大学请设研究院所或请就原研究院所增设学部者，为数甚多，均未经邀准自未便准”，故齐鲁大学的申请“只能暂从缓议”，并建议其先成立文科研究室，等将来办有成绩时再呈教育部改为研究所。⁶⁸

哈燕社方面对齐鲁大学及国学研究所招收研究生的计划更是表示了激烈反对。叶绥夫在致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的信中重申了哈燕社的一贯立场，认为齐鲁大学是小型的综合性大学，主要应发展本科教育，首先是充实大学普通课程，然后才能进行高级课程，培养研究生的工作应由其它更有能力的大学来做。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未能完善本科教育的情况下即去发展研究生教育，实属冒险行为，也不符合哈燕社经费的使用原则。因此，他要求追究国学研究所的拨款使用情况及其每年送哈燕社的财务报告中账目不明之故。在哈燕社的压力下，国学研究所不得不在当年的年度报告中专就此事作了解释，6 月和 7 月又分别致信叶绥夫，详细解说招收研究生一事的前因后果，谓其与国学研究所并无关系，并表示

⁶⁵ 私立齐鲁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暂行组织规程，齐档，J109-03-08，第 39-41 页。

⁶⁶ 《齐大校刊》第八期，1940 年 10 月 25 日，第 4 页。

⁶⁷ 1940 年 10 月齐鲁大学刘世传致顾毓秀（一樵）书信稿，齐档，J109-03-2。

⁶⁸ 教育部顾毓秀致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书信，齐档，J109-03-2，第 67-70 页。

研究生培养计划也尚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尚未正式实施，目前更无扩大之意。现阶段研究生培养所用款项乃为齐鲁大学前几年所收到的教育部补贴积累，花费极少。如果事实证明齐鲁大学有能力培养研究生，教育部批准需要扩大招生时，则政府会有专项补贴拨给齐鲁大学，因而，这一计划不会占用哈燕社专用经费。

但哈燕社方面并不接受这一解释，仍强烈要求停止这一计划，加之此时文科研究所的立案申请没有在教育部通过，1942年，随着顾颉刚离开国学所，此计划遂不得不搁置。同年秋，已注册入所开始学习的研究生由齐鲁大学出面联络转入其他有研究生招生资格的高校，齐鲁大学的研究生培养工作遂告结束。

但顾颉刚并未就此放弃对齐鲁大学研究生计划的关注。1943年，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因为校内压力等原因而辞职，代理校长汤吉禾上任后又多次邀请顾颉刚重回研究所主持所务，希望重新成立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并同意顾颉刚得在所内完成《二十四史》的标点工作。顾即表示同意，还亲自到教育部与高等教育司司长赵畸协商，得到对方的口头允诺。1944年11月，他回所打算重新招收研究生，并计划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国学研究所，留在成都由丁山负责；一部分为培养研究生的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移驻重庆，由顾亲自负责。国学研究所经费由双方平分，待战争结束，再合为一。⁶⁹但是，1945年1月齐鲁大学发生学潮，顾颉刚离开成都赴重庆，这一计划遂遭搁浅。虽是如此，顾颉刚对此事仍未绝望，曾于1945年6月向齐鲁大学校方写信，言明与汤吉禾谈妥之事，若齐大校方若继续支持，则“刚当再到教育部作进一步之接洽，并拟一呈文，经先生定夺及由校缮发”，同时还提供了国学研究所此后的工作计划。惜乎后来仍未能成功。

齐鲁大学的研究生计划虽然仅仅维持了两年即宣告彻底终止，但这短短两年的发展却浓缩了国学研究所延续二十年中一直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首先，齐鲁大学由属于不同国家的14个基督教差会联合支持办理，因校内各派被不同差会、不同国家、不同利益的力量牵制，校政多变，加之时局动荡不安，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正常发展。

其次，齐鲁大学本身学术研究实力积淀不够，虽然在成都时期，得以利用当时的某些特殊条件，延揽人才，增强实力，但总体上仍难以越出人员频繁流动的

⁶⁹ 1945年6月26日顾颉刚致齐鲁大学马尔济并转校务委员会诸先生书信，齐档，J109-03-03，第76-83页。

局面，只要国学研究所内有二、三知名学者离开，学术力量随即大减。同时，正如叶绥夫所言，国学研究所的本科课程设置并不完善且浮动性过大，因此，仅靠几位知名学者的实力来抬高自身地位是难以长久的。

最重要的，还有来自哈燕社的牵制。这个掌握着国学研究所经济命脉的指挥机构，随时威胁着它的生存，寄人篱下的齐鲁大学在这方面的无力与之抗衡。当哈燕社将齐鲁大学定位于小型综合性大学，要求其完全按哈燕社的意志而行时，齐鲁大学对此虽极度反感，但终因财务上的关系，而不得不屈从。

第三章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术成就与影响

如前所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工作宗旨是以研究促进本科教学，这既是他们申请霍尔基金的理由，也是哈燕社一再强调的办所原则。但就齐鲁大学建立国学研究所的初衷来说，着眼点其实更在专业研究方面，此后国学研究所一系列活动的开展也表明了这一点。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开展的研究工作，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特点和问题，所取得的成绩也各异。

第一节 战前的国学研究及其特点

按照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栾调甫的说法：“专门研究，在成立一种有系统之学术与养成本校学生为专门研究之人才。此为本校创立研究所之目的，亦因大学为最高学府，一大学中必有一种或数种专门学术足为学术界之领导者，方克名副其实。而一大学能厕立于世界大学之林，亦惟以此种特殊学术为其因素。一大学之声誉，尤在能养成自己学生为专门人才为其效果。”⁷⁰为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自成立之日起，便十分重视研究计划的制定与实施。根据哈燕社在1931年召集受霍尔基金资助的六所教会大学协商的结果，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抗战前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齐鲁文化”方面，理由则有二，一是齐鲁大学设于山东，其地“为古齐、鲁两国地，齐鲁文化又为自汉以后中国文化之起源，论其重要性实为研究中国近三千年文化之母”⁷¹，研究这一古文化，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所有地理上之便利；二是齐鲁大学发展渊源追溯起来已有七十多年的历史⁷²，其

⁷⁰ 栾调甫致赖恩源书，山东省档案馆藏档，J109-03-3。

⁷¹ 同上。

⁷² 齐鲁大学文学院的前身是登州蒙养学堂，由传教士狄考文和朱莉娅于1864年到达中国后创办，参见《中

发展与山东省具有深密的关系，因此对于研究山东历史文化的工作“尤属义不容辞”⁷³。由此出发，国学所开始的研究工作先集中在山东历代郡县沿革与黄河河道变迁和先秦诸子两方面。这一计划的具体实施，主要集中于考察古迹、收集古物材料和辨伪校订、整理古籍两个方面。因为在研究所初建并缺乏研究条件的情况下，基础材料的搜集尤为日后研究之基础。围绕这一目的，国学研究所开始就山东境内的文物古迹等进行考察搜索，增加所内文物资料的储存量。因受人力和物力的限制，当时国学研究所尚不具备独立考察发掘古迹的能力，因此，这一阶段的古迹考察文物收集工作又多与其他机构合作，如山东省立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山东考古协会等，并在逐步的发展中，逐步与之建立起良好的合作交流关系，参与多项山东风俗调查、考古收集等活动，促进了所内研究的开展。在古籍整理方面，研究所的工作也比较多地集中在善本收集、材料辨伪考证等基础工作方面，如栾调甫的《释监》、《释舍予》等考据文章多与此有关。

稍后，随着人员的增多，研究工作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其时凡属国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在担任教学的同时，一般都承担着相应的科研工作。兹以国学研究所第四、五两年报告书，将当时各成员研究课题列表如下，⁷⁴以窥其一斑。

研究课题	承担人	备注
戏剧研究	舒舍予	
中国法家思想之发展及其影响	慈炳如	
撰著《沈休文诗注》、《谢灵运年谱》等	郝立权	
齐鲁出土古器物之研究 编纂《山东石刻汇目》	齐树平	
山东土语与古音异同之研究	周幹庭	
中国文字之研究、《墨子》研究	栾调甫	
《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	胡立初	
影宋抄本《战国策》校记	彭翔生	
商代甲骨研究、殷墟卜辞后编、殷墟卜辞类考	明义士	

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美]杰西·格·卢茨著，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⁷³ 齐档，J109-03-11，第63-64页。

⁷⁴ 1933-1936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

撰著《戏剧艺术辩证》、《清末之上海戏剧》	马彦祥	
撰著《明辽东边墙建置考》、《后汉初省并郡国考》	张维华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研究所的研究工作着重于打基础，特别是有些研究由于从专注文献转向了注重实物和实地发掘调查，以及重视考古、方言和民俗学等采访，因而取得了较新的成果，如齐树平《齐鲁出土古器物之研究》、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周幹庭《山东土语研究》、张维思《齐鲁方音考》等。另外，在研究视野上，也开始由传统的专注上层社会转移至关注民间地方社会文化，改变了传统的大小观念，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学术需要，对山东地方民间社会的研究大为加强，如范迪瑞《中国之农民运动》、张立志的《中国古代农村生活研究》等。当然，从研究的深度上看，这一时期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研究仍然显得不够，表现出与国内相关学术前沿存在着一定距离。

第二节 走向学术前沿：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崛起

国学研究所迁往成都后，在成都招揽了不少国学大家入所，使其面貌大变，并在研究风格和分量上都与前一阶段大不相同。

顾颉刚主持所务期间，确定了标点二十四史的工作，聘请所内外学者及在校研究生等担任标点工作，并根据抗战的需要，加强了边疆史学的研究。此后钱穆、胡福林、张维华等人的相继加盟，更使所内一时人才济济，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得以跻身于国学研究的前沿。其时国学研究所确立的研究方向如古代史、甲骨学、疆域史、中西交通史等方面，皆为当时国内学术界中国文化研究的热门问题，其发表的成果如钱穆的《史记地名考》和《国史读本》、吕思勉的《魏晋南北朝史》和《秦汉史》、胡厚宣的《甲骨文与商代历史》和《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等，皆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学术界产生良好反响。此外，国学研究所在断代史、分类史、古籍研究、考古等方面也皆有涉猎，有的还处于国内学术界的前沿水平。1940年，国民政府组织了一个十一人的“历史编纂委员会”，其中有一人（顾颉刚、钱穆、吕思勉）均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成员。⁷⁵所内研究之外，顾颉刚还资助一批知名学者做研究所的校外研究员，一时国学所内人才倍增，不断有研究

⁷⁵ 1940年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年度报告，齐档，J109-03-11，第188-196页。

成果出版，如童书业的《春秋史》、容肇祖的《明代思想史》、赵泉澄的《清代地理沿革表》、丁山的《商周史》、《周金文研究》等，皆在国学研究所的资助研究之内。同时，国学研究所还编辑了《齐大国学季刊》、《责善》半月刊、《齐鲁学报》等杂志。

这些成就的取得，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因有顾颉刚这样的有力组织者为整个研究所在人员、研究计划和学术实践方面带来的新气象。其次是校方的大力支持。这一时期的成都，称得上是高校云集，仅华西坝上就有华西协和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校。其中，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四校都是受哈燕社资助并设有国学研究所或文科研究所的教会大学。同类学校和学术机构汇集一处，在合作办学的同时，势必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竞争，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齐鲁大学的不甘落后与发奋图强，甚至这一时期齐鲁大学进行的研究生招生计划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受到了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有研究生培养资格的影响。再次，经济上的支持也是重要保障，前一时期的齐鲁大学经费的积累也为这一时期的阔步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条件。

虽然这一发展势头并未持续很长的时间，但毕竟算得上是该所发展史上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不仅在学术研究有不少亮点，在专门人才培养上也值得一提。当时所内研究员皆配有一名或几名助理研究员，跟随其进行教学研究活动，助理研究员一般由青年学者或校内对国学研究有兴趣的学生担任，这一工作本身就是对学术研究专门人才的培养行为，如后来在学术界取得较多成绩的严耕望、桂琼英等皆在所内做过长时间的助理研究员。

第三节 甲骨收藏与研究

在整个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学术生涯中，还有一项可圈可点的事业，即殷墟甲骨的收藏与研究。甲骨学是近代新兴的一门学科，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其也曾兴盛一时，而齐鲁大学在这一学问的发展中作出过重要贡献。

齐鲁大学的甲骨收藏并非始自国学研究所，而是早在甲骨文刚被发现后第五年即已开始。当时的齐鲁大学尚处于广文学堂时期，两位广文学堂的创立者方法斂（F.H.Chalfant）和库寿龄（Samuel Couling）大量搜购甲骨，两、三年内搜集到五千片之多，并将大量甲骨转让给了英国、美国等地的大学或博物馆。其中，方

法敛还研究甲骨文字，出版了《中国原始文字考》一书，成为最早研究甲骨文字的西方学者，库寿龄和方法敛也是最早搜集甲骨的西方学者。稍后，广文学堂的校长柏尔根(Paul.D.Bergen)也曾大量搜购甲骨，这批藏品后皆保存于济南南关广智院内，为国学研究所明义士整理出版为《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

明义士收购甲骨的时间也比较早。明义士，字子宜，加拿大籍，为加拿大基督教长老会驻河南安阳传教士，英国皇家考古学会会员。当他被加拿大长老会派到河南安阳做宣教士时，正值甲骨不断发现之时，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为他提供了大量接触和搜集甲骨的机会。明义士在所著《殷墟卜辞·自序》中自述于1914年春，“乘其羸老白马，徘徊于河南彰德（今安阳）迤北之洹水南岸”，亲历殷墟实地勘查和搜集探访甲骨的过程。当时，他见农人耕田翻出碎陶瓦砾，“弃诸陇畔，阙状甚古”，后经孩童引路，“环绕河曲，经一荒凉沙野，抵一小窟，窟在西向斜坡上，坡间满被骨屑，一片白色，此即殷朝武乙故都殷墟是也……嗣后多日，辄跨其羸老白马，潜行外出，践次故城遗迹。”这一经历，不仅使他在当地收集到不少零散的甲骨片，还在小屯村发现了几大坑第三、四期甲骨。此后十余年，明义士的甲骨收藏量达到了四万片之多，这在所有私人收藏中都是绝无仅有的，甚至可以和数次发掘殷墟的中央研究院甲骨收藏相媲美。1932年，明义士带着他的甲骨藏品进入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由此开始了该所收藏与研究甲骨的先河。

明义士在国学研究所内工作了近五年时间（1932-1937），在此期间，不仅本人作了大量甲骨整理工作，还使国学研究所得以利用这些甲骨，在陈列室中展览，以提高学生用现代考古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兴趣。他还在较早的高校开设了甲骨学和考古学的课程，传授学生基本的甲骨知识和现代考古理论方法。此外，他对甲骨收藏的保护也值得一提，据其在《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序》中所述，柏根氏所藏甲骨陈列于广智院，后为防损毁，皆用面糊贴于涂墨的厚纸之上，密封入玻璃框内。1933年春，明义士入院考察时，“此三千余年贵重之史料，陈列院中，为多数人所忽视者，盖已历三十载矣”，其中部分已有所损毁。为使这些宝贵的古文字资料不至因毁坏而流失，明义士当即着手将其系统整理一过，拓墨成集，并说明经过：

“予至院中参观，偶见有红色细小之蜘蛛，潜入玻璃框内，蛀蚀粘贴甲骨之

面糊，势将危及甲骨。因商之院长魏礼模博士(DR. H. R. Williamson)，谋为改善保存之方法。经院长魏君许可，遂取出诸片，浸之西洋白漆皮 Bleached Shellac 中(漂白杀毒)，片之折者重为整理接合。并携往北平，觅工拓墨，稍加类次。惟诸片磁面，不无损毁，致令拓本不甚晰，乃就拓本之后，附以摹写，并为释之一卷于后。念氏于三十年前，已注意收藏，且以公于世。今以此卷付印出版，庶不负氏收藏陈列之意也。”

明义士作为一名外国传教士，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北方中国话，写一笔典雅的中国白话文，还能读懂中国先秦典籍，熟悉中国文字学，直至做到辨识、析释难懂的甲骨文，这对他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可惜的是，他虽然早有在研究甲骨的基础上撰写史前中国史的打算，但在国学研究所期间，却著述不多。在国学所，他曾因负责考察山东史地一门，将精力集中于收集山东文化古物。甲骨学方面，他的工作主要是摹拓和整理资料，并在 1933 年课堂讲义的基础上编写印行了《甲骨研究》，整理拓印了柏根氏的甲骨片。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明义士的助理研究员曾毅公在甲骨整理上也做出了不少贡献，先后出版了《甲骨*存》、《甲骨地名通检》、《殷墟书契续编校记》三种甲骨学研究的工具书。当然，这些工作都还只是停留在收藏整理方面。

顾颉刚担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后，邀请了当时已在甲骨学研究上颇有名气的胡厚宣入所进行研究。胡厚宣原就职于中央研究院，并几次参与殷墟发掘工作，对甲骨研究颇有心得，据其自述，在中央研究院七年，因环境方便和师友指导，其整理研究过研究院历次发掘所得所有的几万片甲骨，买全了所有已出版的甲骨文材料书，搜遍了所有已出版的研究甲骨文的专书和论文，至其在成都工作时，其所见过收集到的甲骨已有七八万片之多。甲骨文的材料，本来就十来万片，除去明义士所藏而未发表的三、四万片甲骨，其余材料莫不为其所摩拓收藏。因此，对于精心于甲骨学研究的胡厚宣来说，明义士的收藏无疑对其有莫大的吸引力。因此，当他收到齐鲁方面的邀请时，立即决定应聘前往，甚至为此得罪了史语所方面。

但进入国学研究所之后，胡厚宣才知齐鲁大学因战争中仓促西迁，并未将明义士的甲骨带到成都，明义士本人回国休假后，则因战乱和身体原因一直未能回所。这虽然使他颇感失望，但由于这时他个人在甲骨上的积累已足够丰富，成都

国学研究所内提供条件在当时也尚属稳定，便决定在国学所潜心用功，将十几年之积累成果悉数理出。总计胡自1940年9月后入所，1946年离开，在研究所内前后六年多，在甲骨文的研究方面撰写了大量论著，仅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就在国学研究所的《责善》半月刊上发文7篇⁷⁶，在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1944年列为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的《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四册，1945年的《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2册，更是汇集了其多年研究的精华，在彻底整理甲骨材料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方法统计、比勘、分析、考证，并结合古史、遗迹、遗物等做了精密研究考证，解决了不少甲骨学上的重要问题。其论著问世后得到学术界的多方赞誉，堪称“集五十年来甲骨学之大成”，一再重印，并两次得到教育部颁发的奖金，至今仍享誉海内外。有人称《初集》“对于刻辞义例，析论甚详，从此以后，甲骨上的记事刻辞，遂为世所共知。”《二集》则“不但对以前的种种歪曲事实的说法，有摧陷廓清之功，而且对以后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正确的途径。”⁷⁷

这两部论著之外，这时期胡厚宣还将当时流传的有关甲骨文的论著541种，编成了《甲骨学类目》一册，并在成都期间仍四处收集甲骨，将成都、重庆等地可以收集到的摹本拓片等编成了《甲骨六录》，作为国学研究所专刊出版。1945年抗战胜利，为探寻明义士甲骨收藏是否安好，其不待齐鲁大学迁校便找人代理授课，自费去了平津，欲从平津南下济南，可惜当时交通仍未畅通，济南未能成行，但在北平、天津，他通过购买或借拓、钩摹，又收集到了甲骨万片，回成都后整理撰成了《战后平津新获甲骨集》六册。在当时的战乱条件下，其对甲骨的收集与研究可谓已竭尽全力，虽然哈燕社一直对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成果较为轻视，但对胡厚宣的甲骨学研究却不得不表示推崇，可见影响之大。

第四节 学术期刊的编辑与出版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教学研究等工作之外，同其他许多学术研究机构一样，也办有自己的一些学术期刊，并出版了不少所内同仁的研究专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由于时局等各方面的原因，国学研究所所办刊物的存在时间都比较短暂。

⁷⁶ 《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15-22期。

⁷⁷ 张秉权《甲骨文与甲骨学》，台北：国立编译馆，1988年。

国学研究所的期刊编辑与出版主要集中于抗日战争胜利前，特别是国学研究所在成都之时。及至抗战胜利，齐鲁大学迁回济南，由于哈燕社的强烈限制，国学研究所内连研究都无从开展，更不用说编辑期刊出版了。

期刊的编辑出版与国学研究所内研究工作的开展情况相对应，在成都的国学研究所人丁兴旺，研究成果频出，因此集刊出版成为必要。而此时由于战争原因，纸张和印刷材料等非常紧缺，印刷成本奇高，同时，传运也十分困难。加之，齐鲁大学借地办学，没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和出版部门，故这一时期国学研究所的出版物、书籍等大多通过上海开明书店出版，济南研究所维持时期所出的书则由济南齐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其时国学研究所共编辑出版了四种期刊，包括《齐大国学季刊》、《责善》半月刊、《齐鲁学报》和《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其中《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是由金陵、华西、齐鲁三所大学联合出版的。兹分别介绍如下。

《齐大国学季刊》的出版是承接研究所在济南参与编辑的《齐大季刊》而创，不同的是，此时的季刊为国学研究所专用，不再与文、理、医三院共编。该刊由顾颉刚担任主编，第一期于1940年11月出版，收文7篇，另附后记一篇言明办刊宗旨及退处后方当坚民族文化精神，以与前方将士同负抗战建国使命之决心。原定一年出刊四期为一卷，后因种种原因，在第二期于1941年6月发出后即停刊。

《齐鲁学报》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学报》的简称，是国学研究所在上海发行的一种学术刊物，原定用以登载由国学研究所资助研究人员的论文等，实际发行时间载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学报由钱穆担任编委会主任，顾颉刚、张维华、胡厚宣、吕思勉、王伯祥、徐调孚皆为学报编辑。此刊非定期出版，第一期刊于1941年1月，载文皆为当时名家的研究成果。可惜的是，其与《齐大国学季刊》命运一样，在1941年7月出完第二期后即行停刊。

两种杂志遭遇同样的命运，一方面是战争造成了印刷、传运的困难，另一方面也因哈燕社对其不支持的态度有关。在哈燕社看来，齐鲁等六家教会大学自办刊物过多，质量参差不齐，不仅降低了学术价值，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为改变这一现状，节省资源，它要求在成都的三所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各自停办自己的刊物，而联合编辑出版一种期刊。齐鲁大学的《齐大国学季刊》和《齐鲁学报》由此都被叫停，而改出三校联合编辑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原定为由齐鲁、华西协和和金陵三所大学合办，后又加入了燕京大学，由四大学联合组成编委会，每校各推代表三人组成，各校研究所共同投稿。具体编辑则由四大学研究所轮流担任，每校一年，轮流次序为齐鲁、华西协和、金陵和燕京。第一期即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负责，于1941年9月出版。此刊共出八期，但齐鲁大学在1945年出完第五期之后迁回济南，国学研究所被哈燕社取消而退出此刊编辑。在内容上，此刊是四大学共用之专刊，主要登载四校研究所内专任人员的考证论文、调查报告、重要史料及书报评论，不收外稿。该刊持续时间较长，也是哈燕社极力赞成的办刊方式，由于当时四校研究所内著名学者云集，故发文质量一直比较高，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另外，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济南的国学研究所也出版过两种刊物，一为《国学汇编》，一为《齐大季刊》，均由齐鲁大学校内印刷所排印，出版部发行。

《国学汇编》共两册，分别出版于1932年11月和1934年6月，用以集中刊载国学研究所内成员的相关研究成果，共收集文章17篇，大多数为文献整理、考据类文章。《齐大季刊》共出八期，于1932年12月创刊，一直延续至抗战爆发国学研究所离开济南，勉强出完最后一期。此刊为齐鲁大学文、理、医及国学研究所共有之刊物，而实际上，每期所收文章有一半以上均来自国学研究所，其第三、五合期甚至作为国学研究所收集到的青铜十字拓专号编辑出版。与《国学汇编》相比，《齐大季刊》所刊国学研究所的文章相对要轻松一些，考据类的比重较少，但也仅有舒舍予等人的几篇例外而已，考据、整理类的文章在其中占了大多数。

《责善》半月刊是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成都所办学术期刊之一种，也是当时研究所所办最重要、最有成绩的一份期刊。国学研究所在成都重建后，“从学者初至，恒谓志学未逮，祇缘不知所以入门，譬诸宫墙，无术攀而窥焉”，而研究及所内事务繁杂“惮于简别指点之烦，鉴于借题示范之急，故为此刊以诱导之”，遂有《责善》半月刊的创立，以为研究所及国文、史社两系学生进行练习、研究之用。“责善”之名，取自孟子“责善，朋友之道”说，旨在“晨昏督责，共赴至善之标”，以为探讨学术，“将来建国之中得自献其几微之力”。⁷⁸期刊创设后不久即于内政部登记在案，定于每月一日或十六日出版，由顾颉刚担任主编，收

⁷⁸ 顾颉刚：《责善》半月刊发刊词，1940年3月16日。

录校内师生所作之短篇论文、笥记通信、书籍或论文提要、演讲笔记、国内外学术消息等，间或载相关启事及广告，每期约三万字左右。从半月刊所载文章看，大多为所内学者的研究指导文章，并有所内外学者关于学术问题相互探讨的来往信函及多位学者的学术札记连载。如顾颉刚的《浪口村随笔》、王树民的《洮州日记》、张维思的《冰廬读书随录》、李鑑铭的《康遊杂记》、钱穆的《思亲彊学室读书记》等，内容充实，指导性强，销售一直非常好。前后共出二卷四十八期，在当时颇有影响，虽然发行册数一增再增，却仍供不应求。1941年2月，半月刊推出重价征求第一卷各期启事，称“本刊第一卷先出各期早经售罄，近求购者仍纷纷而至，兹特登启事征求，凡欲割爱者……当以加倍三价奉酬”。⁷⁹此后这一内容的启事不时出现于刊内，足见当时《责善》销路之好。另外，半月刊还因此得以有了部分广告收入。至1941年，已有许多刊物与之联络广告事宜，以致该刊还拟出了版面广告价目，依广告位置和所占版面数量收费⁸⁰。随着销售量的增加，责善的出刊费用因其销售收入即可解决，国学研究所已不再担心它的出版销售问题。

虽然《责善》在外销售发行良好，但他最终也没能逃脱同国学研究所其他刊物一样的停刊命运。即使顾颉刚为其保留而同哈燕社方面力争，也仅使半月刊延长了半年时间，至1942年4月，半月刊同样在物资紧缺与哈燕社的反对声中宣布停刊。虽然半月刊的存在时间较短，但对国学研究所的教研工作和齐鲁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培养等都做出了贡献，在当时的学术界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其建立、发展和终结的二十余年间，展示了中国近代一所中小型综合性大学内学术机构的发展轨迹，也让我们看到了教会大学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转变与成绩以及其间存在的矛盾与问题。

一方面，对齐鲁大学来说，国学研究所的建立不仅充实了文学院的教学与研究力量，还使其国学教学与研究从传统迈向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增强了其作为一所综合性大学的实力。对时代而言，国学研究所加强基础建设，并提供比较稳定的聘任、研究和出版资金，在动荡年代为一批学者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学术教学

⁷⁹ 《责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三期，附录，1941年2月16日。

⁸⁰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责善半月刊启事，1941年6月，齐档，J109-03-02，第37页。

与研究条件。在此基础上，国学研究所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就，在同类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机构中也是比较突出的。

另一方面，国学研究所由于规模较小，人员较少，难免带来了其发展中带有过多个人色彩。加之，教会大学在办学过程中自主能力相对来说较弱，又处于动荡的战争年代，因此，在内部基础和外部环境的制约下，国学研究所发展动荡不定，没有形成稳定的具有一定规模的教学和研究阵容，教学与学术成就相对于其二十余年的发展，数十万元的投入来说仍属有限。

总而言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在一系列社会背景下成立、发展，对当时的学术研究主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国学研究所未能引领国学研究潮流，发展成为国学研究的重镇，但从其二十余年教学、学术研究水平的起伏中，我们可看到齐鲁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在对待中国文化问题上的态度和努力，反映了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方面的活动，是教会大学对中国社会变化的呼应。这一呼应为学术界重新认识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学术教育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全面认识教会大学的学术功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附录：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职员一览

姓名	任职	备注
李雲林		
胡立初	助理研究员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毕业，前清举人
栾调甫	国学研究所主任所长	
彭翔生	助理研究员	山东高等学堂毕业
郝立权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学士，国文系主任
舒舍予		北平师范学校毕业，国文学系文学教授
明义士	研究员	多伦多大学实用科学学士，挪克斯神学士
齐树平	研究员	北平农科大学毕业，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 国文系研究教授
Mr.W.F.Ting	名誉讲师	
王献唐	名誉讲师	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
余天庥		美国克拉克大学社会学博士，社会经济系主任
许炳离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学士
慈丙如		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国文系哲学教授
范迪瑞		齐鲁大学文学学士，社会系助教
张立志		北平燕京大学硕士，历史政治系教授
许慕贤		齐鲁大学文学学士
李湧泉	助理研究员	伦敦大学硕士
张俊明	图书著录员	
崔敬生		
王宪臣	图书助理员	
张锡礮		美国爱欧瓦大学理学硕士，社会系主任
周干庭		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前清拔贡，国文系文 学教授

胡道远		美国密尼苏打大学市政硕士，社会系讲师
皮松云		梅阿梅大学毕业，社会学讲师
赵振之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士
朱宝琛	助理研究员	齐鲁大学文学学士
马彦祥		复旦大学文学学士，国文系副教授
张维华		北平燕京大学硕士，齐鲁大学文学学士
刁瑞义	书记员	
曾毅公	助理研究员	
李玉泉		
王敦化	助理研究员	齐鲁大学文学学士
马宗薌	国学研究所主任	国文系教授
孙碌	助理研究员	齐鲁大学文学学士
张维思	助理研究员	齐鲁大学文学学士，中文系讲师
刘世传	所长	
杨懋春	助理研究员	燕京大学硕士，齐鲁大学文学学士
彭養田	书记员	
顾颉刚	所主任	
钱穆	所主任	国文系主任，中国史教授
吕思勉	研究所上海代理人	
胡福林	研究员	北京大学学士，国立中央研究院硕士，国文系
教授		
范午	助理研究员	B.A.National Szechwan U.
曾繁康	助理研究员	B.A.Nat. Central Polit Academy Assistant
王育伊		燕京大学硕士
赵南溟	助理研究员	Graduate College of Fine Arts Shanghai
顾自明	书记员	
张学润	书记员	
刘书琴	书记员	
叶彬如	书记员	

孙次舟	中国文学讲师	
黄作平		西北大学文学学士
庞春第	助理研究员	Graduate of the Tientsin Teachers College
魏洪祯	助理研究员	西北大学文学学士
杜光简	助理研究员	西北大学文学学士
李芳霖	财务负责人	
朱锡洲	书记员	
陈希三	书记员	
容肇祖	资助研究员	
赵泉澄	资助研究员	
童书业	资助研究员	
江应樑	资助研究员	
方国瑜	资助研究员	
Mr.Martin K.Norins		资助研究员
丁山	资助研究员	国立北京大学学士，国文系主任
孙玉芳	资助研究员	
杜奉符	资助研究员	
沈延国	资助研究员	
蒋维乔	资助研究员	
唐奎璋	资助研究员	
钟鳳年	资助研究员	
陈准	资助研究员	
沈鑑		
林昇平		中文系助教
彭雲生		中文系教授
蒙思明	助理研究员	
王佛崖	助理研究员	
李为衡	助理研究员	文学学士
孔玉芳	助理研究员	西北大学文学学士

严耕望	助理研究员	武汉大学文学学士
许毓峯	助理研究员	文学士
钱树棠	助理研究员	
潘仲元	助理研究员	
佟志祥	助理研究员	
Ch`ung I Ch`iao		图书管理员
汤吉禾	名誉研究员	哈佛大学哲学博士，齐大校长
侯宝璋	名誉研究员	齐鲁大学医学博士，齐鲁大学病理学教授
Sun Hsūn-yan	书记员	
桂琼英	助理研究员	
李青	图书馆管理员	齐鲁大学文学士
吴金鼎	所主任	伦敦大学哲学博士，文学院院长
杨殿甲	图书馆管理员	齐大史社系毕业生
孙伏园		国立北京大学学士，国文系教授兼主任
李相珏		国立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士，国文系副教授
常燕生		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士，史学系教授
吴天墀		国立四川大学学士，史学系教授
束天民		国立中央大学学士，国文系教授
彭举		国文系教授
李伯卿		国立中央大学学士，国文系副教授
Hsing Chao-chun		燕京大学文学硕士，社会学系任职
刘茂华		南京大学文学硕士，国文学系任职
Hu Yen-chun	图书馆员	副教授
Fu Kuang-ching		图书馆助理编目员兼职
Heng Chao-huei		图书馆设备护理员
Jen Chung	图书馆设备护理员	
Wang Tu-an	图书馆杂务工	
吴忠匡		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毕业，国文系副教授
徐庆誉	兼职	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国文系教授

傅斯稜	兼职	毕业于 Chekiang University, Hangchow. 国文系
副教授		
许衍梁	兼职	北平天主教大学文学士，史社系副教授
万九和	兼职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士，史社系教授
吴鸣岗	兼职	燕京大学文学士，史社系助教
Martin Yang		
Hsing Chao-chün		
Fu Kuang-ching		图书馆助理编目员
Heng Chao-huei		图书馆设备护理员
Jen Chung	图书馆设备护理员	
Wang Tu-an	图书馆杂务工	
徐庆誉	兼职	英国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国文系教授
傅斯稜	兼职	毕业于 Chekiang University, Hangchow. 国文系
副教授		
许衍梁	兼职	北平天主教大学文学士，史社系副教授
万九和	兼职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士，史社系教授
吴鸣岗	兼职	燕京大学文学士，史社系助教
Martin Yang		
Hsing Chao-chün		
Wu Chin-ting		
Mrs Jacot		
Mrs Hsü	图书馆英文编目员	
Meng Chao-hui		图书馆记录员
Shih Ping-k'un		图书馆杂务工
Mr F.S. Drake	图书馆总管	
许文雨		毕业于北平 Ta-chung 大学，国文系副教授
杨勉斋		齐鲁大学文学士，美国 Cornell 大学哲学博士，
史社系教授		
王锡昌	全职讲师	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国文系副教授

严薇青	兼职讲师，	北京大学文学士
琦书畊		毕业于北平前中华大学，国文系讲师
黄绍鸣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林树惠		毕业于燕京大学，史学系讲师
黄雨秋	兼职	国文系教授

参 考 文 献

【一】、档案资料

1、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历年所向哈燕社提交的年报（1931—1943，1945—1950）。

2、国研所杂件：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致吴克明书信 1 份

齐大校刊关于国学研究所之活动消息报道若干

刘世传：《呈为本校创立文科研究所请求立案事》呈教育部长陈（草稿）（1940年8月14日），附《私立齐鲁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暂行组织规程》、《私立齐鲁大学文科研究所历史学部职员录》、《民国二十九年年度本所拟开设科目表》

齐鲁大学、金陵大学、华西协和大学三校校长致依立瑟夫教授书信（1941年6月12日）

齐鲁大学布告类文件资料若干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责善半月刊启事》（1941年6月）

《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奖学金办法》（1942年1月21日）

《拟为文科研究所（即国学研究所）研究生延聘之名誉导师》名单及方向
私立齐鲁大学公函（草稿）

私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职员简历（部分）

私立齐鲁大学校董会章程（1936年2月21日）

《季刊第八期（已在付印中）之目录》

依立瑟夫与吴克明来往信件（1945—1947）

《国学所拟聘之名誉研究员》

国学研究所内来往信函

《国学研究所同人现在研究中之问题》

国学研究所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信函

国学研究所与胡佛燕京学社来往书信

胡福林：《齐大国学研究所甲骨文字部分复员意见书》

教育部致刘书铭书信

顾颉刚致刘书铭书信

3、其他相关资料

《中华民国教育年鉴》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

《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一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辑出版，1935.1

《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一览表》，教育部统计室编辑出版，1936.8

《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最近实况》黄觉民编，1941.7

《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二十一年度》，教育部编，1935年

《全国高等教育统计：二十年度》，教育部编，1933年

《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统计：二十一年度》，教育部编，1934

《全国高等教育统计》教育部编，1937.7

《全国高等教育概况简表：二十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编，1933年

《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王觉源编辑，重庆独立出版社，1941.3

《最近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概况一览》，中国青年互助会总会编，中央青年出版社，1948年

《最近全国高等教育概况》教育部编，1936年

[二]、文史资料

《山东文献》，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

《山东省志·教育志》，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3月

《民国山东通志》第四册，台北：山东文献杂志社出版，民国九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朱式伦：《齐鲁大学及其附属机构介绍》，载《20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教育卷》，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黄河出版社，2004年8月

许慕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简介》，出自《济南文史资料选辑》，1984年12月

张士新：《我所知道的齐鲁大学》，出自《山东文史集粹》（修订本），山东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北京

张昆河：《齐鲁大学、明义士与甲骨学研究》，出自《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

十一辑，济南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1995年12月

沙嘉孙：《著名学者王献唐先生》，出自《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11

栾登：《栾调甫和他的著作》，出自《文史资料》第二期，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山东省文史研究馆编，1990年12月

栾登、栾汝珠：《栾调甫的墨学研究》，出自《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1月

[三]、齐鲁大学和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之出版物资料

1、国学研究所相关期刊、杂志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5期

《齐大月刊》

《齐大历届毕业生录》（1876—1935）

《齐大文理学院章程及招生简章》1937年

《齐大旬刊》

《齐大季刊》1-7期

《齐大国学季刊》新第一卷第一、二期

《齐大校友通讯》

《齐大校刊》

《齐鲁学报》1-2期

《国学汇编》1-2期

《责善》半月刊，1-48期

《济南私立齐鲁大学图书馆概况》，1936年

2、国学研究所相关出版专著

马宗芎：《释宫室》、《尔雅本字考》

王敦化：《明版书经眼录》

吕思勉：《先秦史》

张立志：《山东文化史研究》

何逊：《何水部诗注》

张维华：《汉史论集》、《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

张维思：《古今语》

周干庭：《老子音释》、《安邱土语志》

范迪瑞：《隋唐时代农民运动研究》、《中国古代农民运动研究》、《历代年号
通讯》

明义士：《柏根氏甲骨文字》

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路从》二、三、四集、《甲骨六录》

容肇祖：《明代思想史》

童书业：《春秋史》

曾毅公：《甲骨地名通检》、《殷墟书契编校记》、《山东金文集存先秦编》、《甲
骨地名通检》

潘承弼：《明代版本图录初编》

[四]、相关研究资料及检索工具书

马长林, 吴小新主编：《中国教会文献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中华教育界》(1912-1950), 上海：中华书局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刘家峰、刘天路：《抗日战争时期的基督教大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李楚材：《帝国主义侵华教育资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出版社, 1987.7

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 年—1927 年中国非基督教运动研
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5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中
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续编》，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何凯立著 陈建明, 王再兴译：《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1912-1949》，成都：四
川大学出版社, 2004

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吴梓明：《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5

吴梓明：《基督宗教与中国大学教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杰西·格·卢茨著, 曾矩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7

林治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台北：基督教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

社, 1992.7

郑登云:《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4

郭查理著, 陶飞亚、鲁娜译:《齐鲁大学》, 珠海: 珠海出版社, 1999

陶飞亚、吴梓明:《教会大学与国学研究》,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05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顾潮:《顾颉刚年谱》,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长沙: 岳麓书社, 1986.7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1932)

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章开沅主编:《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6

章开沅主编:《传播与植根: 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章开沅主编:《社会转型与教会大学》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8

阎焕东编:《老舍自叙——一个平凡人的平凡生活报告》,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8

鲁娜:《顾颉刚与教会大学》,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年第 5 期

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7

潘懋元:《中国高等教育百年》,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潘懋元, 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 高等教育》,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